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王敏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8)

摘要: 误读理论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 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文学接受的角度, 认为误读是读者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 区别于作者原意, 也区别于杜撰; 二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 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 三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 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 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内在体系的研究, 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

关键词: 误读; 解构主义; 互文性; 反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2-0158-05

“误读”是中外文学史上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考其英文词“misreading”的语法结构, 它是在“reading”前添加“mis-”的衍生形式, 以正读的存在为前提, 是所谓“正确阅读”之上的一种意外、一种离格。牛津词典对“误读”的解释是: “read or interpret (text, a situation, etc.) wrongly.”即“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文论, 一直将作为阅读方式的“误读”视为一种应该避免的“错误”。这种观念是建立在语言“表征模式”之上的, 认为文学文本一定存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本质, 读者能够真实地阐释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在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 文本意义的多元性、矛盾性遭到忽视, 文本阐释追求一元、统一的意义, 因而“误读”成为被否定的阅读现象, 其价值仅在于证明肯定性的“正读”的存在。

一、“误读”思想的历史性发生

传统“正读”、“误读”的区别标准主要在于是否符合作者原意, 这是西方文学传统阅读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或多或少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 是一种再创造。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在确定文本意义的方式、方法上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 然而在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作者意图

决定意义这些观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使是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生命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等批评思潮, 也都是以作者为中心来探究意义, 注重从作家的思想、情感乃至无意识来挖掘文学作品的含义。文学作品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载体, 因而作者是作品意义的来源, 作者意图是阅读和阐释活动“正”、“误”的判断标准, 凡不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都是错误的解读。

20世纪, 随着哲学领域“理性”权威的消解, 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作者权威也受到挑战, 文本和读者作为新的主体受到广泛关注。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 “20世纪西方文论属于一种思想领域, 把玩语言、符号和形式的目的在于释义, 在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 它主要是一种阐释学, 而不只是创作学。”^{[1](28)}以作者研究为主导的传统文学理论, 开始向文本和读者中心的研究方向转换,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 文本系统、读者系统和解构系统。

就文本系统而言, 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 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相继出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三大思潮, 成功地把文学意义研究从“作者意图论”转向“文本中心论”。对于语言问题, 传统语言学多是从语法和句法的角度分析, 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的符号体系, 因而传统文学批评也多是关注文学语言对现实的表现力, 文学语言是现实指涉物的附属之物。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对传统的语言表征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新批

收稿日期: 2012-12-10; 修回日期: 2013-01-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51088);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1JK0283)

作者简介: 王敏(1980-), 女, 湖北襄阳人, 文学博士,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文艺理论。

评派革命性地把语言上升到文学本体的高度，认为文学性取决于修辞性的语言，文本意义的实现是在文本语言内部而不是外部世界，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促使西方文学批评走上了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一度在英美文坛成为批评的基本范式。结构主义则几乎完全排斥了作品之间的差异，寻找着一类作品所共同拥有的结构，以普遍结构模式的分析深化了文本中心的意义观。这些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都把文本看作具有明晰、稳定的整体，把阅读、批评变成纯客观的阐释工作，试图通过修辞的、结构的语言研究穷尽文本内在的涵义。

德国接受美学和美国读者反应批评是读者中心论的批评流派，他们的共同主张是：文学批评是读者反应的记录，文本是留有空白的“召唤结构”，带有“期待视野”的读者是文学阐释的真正主体，以其能动性的阐释填充文本的空白，参与文学意义的创造过程。尽管读者系统文论倡导读者阅读的多样性，但它仍然没有超出文本意义确定性的范畴，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补充了文本空白之后，文本就得到了完整的意义，文学文本的可理解性是无庸置疑的。为了防止读者阅读中出现偏差，伊瑟尔甚至提出“隐含读者”的概念，意图通过标准化的读者阅读来实现文学意义的正确解读。可见，虽然作者的权威不再发生决定性作用，文学文本的阅读还是要服从“正确阅读”的规范，只是这些规范是以读者为中心来建构的。

如果以艾布拉姆斯“艺术批评的诸坐标”为参照系^{[2](5)}，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论主要是以“世界”和“作者”及其之间关系为意义来源，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以“文本”为研究重心，读者系统文论则是把“读者”作为意义研究的中心。

在文本意义研究问题上，真正实现颠覆性转变的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也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奠基者，他提出“作者之死”观念，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倡导“可写的文本”，这可以看作是“误读”思想的萌发。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家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宣告了传统“正读”的不可能和“误读”的绝对性，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全面展开。就耶鲁学派的学术历程来看，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被誉为解构主义的宣扬书，也是耶鲁学派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其发表标志着耶鲁学派展开文学解构活动的起点。在这篇演讲中，结构主义的中心全然消解，探讨文学的另一种方法取代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就是“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德里达从此与美国思想界、与耶鲁学派其他理论家结缘，从1966年起便定期在美国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保罗·德·曼、哈

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一起组成了蜚声一时的“耶鲁学派”。耶鲁学派把德里达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首先由德·曼和米勒分别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论，然后发展成为包括哈特曼和布鲁姆在内的强大文学评论队伍。

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作者中心、读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被全面消解。一部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意图、读者经验所能穷尽的，也不会限制在封闭的文本系统之中，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对文本的解读是无限延展的。于是，“误读”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西方解构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1973年—1976年，布鲁姆“诗论四部曲”的面世，揭开了误读研究的序幕，“一切阅读即误读”成为著名的解构宣言。“误读”是绝对的存在，任何所谓的“正读”，由于无法证明自身的绝对正确性，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误读，或者用布鲁姆的话说，只是相对于“强误读”的“弱误读”罢了。在这里，“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划上等号。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其他学者德·曼、哈特曼、米勒有意无意地呼应了这一口号，尤其是德·曼的修辞理论和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毫不留情地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体系，为“误读”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误读”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在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创造性的阅读方式，一时成为争相议论的话题，引发种种理论。

二、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基本内涵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精髓，用一句话来概括为：文学文本是修辞性的，因而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对文本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误读”。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布鲁姆提出的文学创作中的“误读”，重视文学创作和阅读中人的主体性，偏重误读主体的思考，认为误读产生的内在动因是作家创作中身为“迟到者”的焦虑心理，后辈作家运用语言上的修正式比喻对前辈进行解构，并把修正过的技巧和题材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从而走出前辈的阴影、获得创新。从这个角度看，“误读”是文学创作的普遍性规律，它具体表现为比喻语言的运用，同时具有心理批评的特征。误读理论的另一种形态是德里达、德·曼、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修辞性研究，主张误读与主体无关，是语言修辞性的必然结果，修辞导致文学语言具有自我解构的性质，在表达一种意义的同时又否定它，任何一种阅读方式都是相对的正读和绝对的误读，从而使文学解读得不到终极意义，在意义的层层延伸中推向前进。

可见,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有两个层面的解构性,一是创作中对传统作品的解构,二是阅读中对文本意义的解构。“误读”作为一句理论口号为世人所知,凭借的是第一种即布鲁姆的理论,它是一种关于作者的主体性研究,然而自从布鲁姆“一切阅读皆误读”提出以来,“误读”已经进入解构主义文学意义研究领域,成为一种解构式的阅读理论。虽然各理论家思想差异很大,尤其关于误读的成因更有布鲁姆的有意识误读与德·曼无意识误读的重大差别,但他们在反对传统文学观念、揭示文本意义不确定性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流派,是有必然性的。总体来看,作为阅读理论的“误读”比作为创作理论的“误读”在当代文论中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且创作中的“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阅读形式。因此,本文在厘清两种形态“误读”的同时,研究的侧重点偏向后一种形态即作为阅读理论的“误读”,以此来解析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价值及其局限性。

语言修辞研究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重要研究方法,这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一个表现。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来挖掘文本内在的矛盾性,这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共同策略,也是解构式“误读”产生的重要方式。德·曼对寓言、修辞与语法的新型关系的研究,是整个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从语言修辞性这一基点出发,布鲁姆对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做出“反抗式批评”、米勒研究语言的“重复”现象,哈特曼倡导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批评的创作性,这些都是对传统封闭语言观和单一化阐释方法的解构。正是语言的修辞性导致了文本意义的多元,使得文本意义不能化约为一个封闭的阐释体系,必须在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把文学文本的修辞张力释放出来。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误读理论在具体主张上有区别,但在挖掘语言修辞力量方面具有共同的诉求。语言的维度可以视为解构批评家共同的理论倾向,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的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是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直接颠覆。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曾说:“表意不过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的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转换,意义便是这种置换代码的可能性。”^{[3](9)}“置换代码”是一切形式主义文学阐释活动的本质,新批评研究的是文本内部符号的置换,结构主义注重文本整体结构的置换。在这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虽然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但能指自然地寻求其固定的所指,并与之构成一个确定的单位,因而文学意义具

有稳定性。解构主义批评同样是一种文本符号置换的语言研究,然而根本不同的是,解构批评打破了新批评的自足封闭性和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主张文本内部、文本之间的修辞性意义的无边界置换,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转换的过程是有限定的,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整体或中心的诉求来指导这种转换,它是一个不断延异的过程而不是某一固定的结论。这是因为,解构主义批评家则把意义视为能指的踪迹运动,文学文本中的“能指不断地变成所指,所指又不断地变成能指,而你永远不会达到一个本身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4](126)}。语言不再呈现一个清晰、明确的结构,语言是一张无限蔓延的网,能指之间不断地交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在场与缺席的因素同时纳入人们的视野,意义在不确定性中不断衍生,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对文学差异性的强调,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颠覆力量的起因,也是它与以往阅读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差异性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主张,演化出各个角度的文学误读思想。德里达提出不同于索绪尔的差异理论即“延异”理论,布鲁姆对前后辈作家作品关系的探讨是创作中的差异研究,德·曼的修辞理论是文学语言符号内部差异的研究,米勒“寄生性”理论是文本各部分、文本与文本之间差异的表现。美国学者芭芭拉·约翰逊对解构批评中的“差异”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定位:“差异并不是某一物区别于另一物的因素,它不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至少不是在两个独立单位之间的区别)。它是事物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但不能组成文本的个性,而且就是这种差异在暗中破坏了个性概念,并无限地阻止了文本各部分或意义累加起来的可能性,它无限地阻止达到一个总体的、完整整体的可能性。”^{[5](166)}解构主义批评把“差异”理解为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它是否定性的,破坏了文本结构及意义形式的统一性,使得文本的各种意义阐释具有独立的价值,每一种阐释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无法在相互比较中筛选、整合和统一,这样,“意义不是积极的刺激的一种积累,而是一种连续的否定,是对于被论述事物之中的种种差异范围的认识”。^{[6](214)}意义只能以绝对的差异状态并存于文本之中,新的意义形式是对之前意义形式的否定,对意义的所有阐释也就都是难辨真伪的、分裂的误读形式。

对意义不确定性的反复强调,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重要特征。巴特对“可写的文本”的强调,哈特曼对文学批评创作性的倡导,都消解了作者意图的权威,赋予批评家多元阐释的自由;布鲁姆的诗学影响研究,揭示了后辈作家对传统作品进行歪曲从而超越的心理

动机，这种歪曲和超越就是对确定性的反叛；德里达用文本的边缘成分颠覆主流性阐释，德·曼用“语法的修辞性”来代替“修辞的语法性”，米勒对文学重复现象的研究，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关于意义确定性的追求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文学阐释活动必然走向意义不确定的境界。意义不确定的思想影响深远，是解构主义批评其他观念的基础。“误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只作用于文学阅读研究的领域，它在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上都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质疑和颠覆：从文学本体论层面，取消了文学的“文本性”而代之以“文本间性”；否认作者的权威，不承认作者是文本的来源；在阐释的问题上，认为文本是自我阐释的，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权威阐释被语言的“比喻游戏”所取代。由此可见，“误读”在解构批评家看来是文本的内在属性，是一切文学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西方解构思潮关键性命题的误读理论，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

三、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现状

传统文论关于“正读”已经积累了系统化的理论，然而随着文学及阐释的多元化倾向的日益明显，文学研究已经日益走出精英主义，以各种新型的观念和理论来适应新的文学状况。随着文学载体的发展，当代文坛出现了新的文学形态如网络文学，更有伴随着反经典的思想而出现的戏仿文学，传统追求确定意义的阅读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些新型文学的研究之中，“网络评论”“戏说”这样的文学批评形式应运而生。新出现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现象，必然要求新的文学及批评理论来加以解释。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在独特性、批判性方面依然锋芒毕露，对当下许多文学现象能够做出有力的理论回应和支持，比如“网络评论”层层推进却又散漫交织的批评形式就是解构主义“误读”运行的外在表现。因此，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误读理论，作为一种尚不过时的理论资源，应该得到清晰的认识和总结，使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发挥现实性的作用。

西方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是和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整体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解构主义思潮对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评论界对解构主义或高度赞扬、或严厉批评，态度清晰。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误读理论也是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具体说来，评论家对它有两种态度：一种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误读理论是对文学意义的破坏，

具有虚无主义倾向，这一派主要有赫施的作者意图决定论、艾布拉姆斯的传统批评观；另一种则是具有解构主义倾向的理论家，认为误读理论的破坏和否定只是表象，也包含有更深层的创造和建设，代表人物有乔纳森·卡勒、斯皮瓦克等人，他们除了阐释解构主义批评的理论精髓之外，还把它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联系起来考察解构主义批评观的积极作用和实际影响。不论褒贬，误读理论是洞察解构主义思潮在批评领域的颠覆力量的一个极佳视角。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文学批评，对“误读”现象和理论主要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展开^①。这部分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误读”是区别于“正读”的别有所解，读者在作品“空白”的框架内来驰骋想象力，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从审美心理结构的视角分析“误读”产生原因，认为读者的审美心理定势及期待视野制约着读者的审美接受活动，形成了对作品意义内涵发现的差异；另一研究方法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交叉之处寻找“误读”接受之成因，指出除了文本的“空白”结构和解读者个体差异之外，“诗史互证”、“以意逆志”以及“政治伦理道德之比附”都是形成“误读”现象的因素^②。这类研究运用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并且和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国理论界对误读理论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③。这一领域同样吸收了现代阐释学关于“前见”和“先行结构”的理论，并且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层面解释“误读”产生的深层原因。比如，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媒介和路径，翻译中的“误读”，除了显在的由于语言功力不足造成错误这一原因外，更深刻的隐在原因是不同文化背景所导致的认识和心态差异。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误读”现象，一方面显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和沟壑，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交流在更深层面展开提供了前提，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异质文化为观照本土文化提供了新视角。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最可贵、最有价值的是在深厚文化基础上的独创性发现。“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文化交流现象而受到关注，当前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它也将得到更广泛、更深刻的研究。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与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概念，各自有不相重合的研究侧重点，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然而，从广义的“阅读”层面理解，虽然研究的对象有区别，但它们都是一种阅读理论。因此，

它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推进、共同长进。

国内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④,或者是耶鲁学派或者说整个解构批评的谱系研究^⑤,或者把误读作为基本文学理论研究,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只是研究的一个侧面^⑥,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自身内在体系的研究,把它放在巴特、德里达、耶鲁学派各家的解构主义批评思潮的系统框架中来观照,探究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重要命题的误读理论的内部构成,从而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扩宽文学阅读研究的视野,以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来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总之,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作为一种激进的阅读理论,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和冲击力,为西方文学批评史注入了生机、提出了很多有生发空间的理论问题,对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尤其是文学阅读理论也颇多启发。因此,虽然解构主义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对其误读理论的认识还没有完结,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及其相关评论的探讨,理解这一理论的内涵、意义及影响。只有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把它更好、更有效地运用到我国的文学批评建设上来,以其积极价值来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注释:

① 这部分理论成果有:汪正龙《“正读”、误读与曲解:论文学阅

读的三种形态》、王顺贵:《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孙中田等《文学解读与误读现象》等。

② 廖学新《误读与点化:布鲁姆诗论与江西诗派诗论比较》。

③ 专著:乐黛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与龙》。主要论文:陈跃红《走出困扰——试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及其出路》、董洪川《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研究》、张利群《论文化传播中的文学误读及意义》、曹顺庆、周春《“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

④ 如:胡宝平《论布鲁姆“诗学误读”》、郭军《保罗·德·曼的误读理论或修辞学版本的解构主义》、昂智慧《阅读的危险与语言的寓言性》等。

⑤ 如:陈本益《耶鲁学派的文学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昂智慧《保罗·德曼、“耶鲁学派”与“解构主义”》、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崔雅萍《论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苏宏斌《走向文化批评的解构主义》等。

⑥ 如:李兵《文学误读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张中载《误读》,等等。

参考文献:

- [1]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 M·H·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M]. 北京大学出版, 1989.
- [3] A·J·格雷马斯. 论意义(上)[M]. 吴泓缈、冯学俊.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 [4] 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5] Johnson, B.,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alzac’s ‘Sarrasine’ and Barthes’s ‘S/Z’”, Rpt. in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Ed. Young, R. Bosto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 [6] 哈特曼. 荒野中的批评[M]. 张德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ON the Misreading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WANG Min

(Chinese Department,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Misreading theory is an essential theory in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is paper tries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d broaden the horizon of literature reading research by examining the occurrence, connotation 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 of misreading. The research of the topic in China is mainly done from three sides: the first is the side of literature acceptance and misreading is regarded as the response to the appeal structure of one text; the second is in the field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Research and misreading theory is stressed as one valid methodology; the third is the misreading theory of the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d this side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the inner system of the deconstructive misreading theory.

Key Words: misreading;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meaning

[编辑: 胡兴华]